

【教育部名栏·孙子研究】中国兵学史研究专题

今本《淮南子·兵略训》中多种 互相冲突的军事思想辨析

——兼证今本《淮南子》中普遍存在注文羸入正文现象

邹旻

(安徽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安徽淮南 232001)

摘要:今本《淮南子·兵略训》中存在多种明显互相冲突的军事思想,涉及对于战争起源的认识、对于战争基础的理解、临敌制胜条件的判断、将领指挥原则的总结等方面。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今本《淮南子》中羸入了大量可能出自东汉时期的注文。注家援引前代各种军事理论对《淮南子·兵略训》作阐释,又加上各自的理解发挥,从而导致今本《淮南子·兵略训》存在多种互相冲突的军事思想,同时在文字上也表现得凌乱无章、难以卒读。厘清这些夹杂在一起且互相冲突的军事思想,阐明其理论源头及产生时代,可以帮助充实中国古代军事理论发展的细节,同时也可以从一个侧面佐证今本《淮南子》中普遍存在注文羸入正文现象。

关键词:《淮南子·兵略训》;今本;注家;军事思想;注文羸入

中图分类号: E 892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486/j.issn.2097-4973.2024.02.004

今本《淮南子·兵略训》中存在多种明显互相冲突的军事思想,涉及对于战争起源的认识、对于战争基础的理解、临敌制胜条件的判断、将领指挥原则的总结等方面。以往的研究一般都将《淮南子》作为一部完整的作品来理解,即使古今学者早已注意到《淮南子》中大量存在文字重复驳杂的现象,但一直都没有怀疑过《淮南子》作为一部作品的整体性。例如,谢国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概论》说:“《淮南子》是淮南王刘安和他的一些门客集体搞起来的一本书。内容非常庞杂,其中《兵略训》是集中讲军事问题的,涉及战争的目的,用兵要略,结合历史上的一些战争,讲的东西很多。”^[1]这应是默认《淮南子》是一部完

整的作品。实际上,“根据今本《淮南子·要略》中的文字,结合今本《淮南子》其他各篇的情况来判断,今本《淮南子》中事实上同时存在着‘属书’和‘书论’两种文本”^[2],“而且不论是刘安原著的‘属书’文本,还是这个‘书论’文本,都夹杂了许多零散的注文,这些零散的注文还出自不止一位注家之手”^[3]。今本《淮南子·兵略训》也羸入了大量可能出自东汉时期的注文,从而导致其中表述的军事思想存在很明显的冲突。厘清这些夹杂在一起且互相冲突的军事思想,阐明其理论源头及产生时代,可以帮助充实中国古代军事理论发展的细节,同时也可以从一个侧面佐证今本《淮南子》中普遍存在注文羸入正文现象。为方

收稿日期:2024-07-01

基金项目:安徽理工大学社会科学联合会重点项目“秦汉规范字使用与秦汉传世文献文字补改研究”(SKL2021202203)

作者简介:邹旻(1976—),男,安徽淮南人,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淮南子》研究。

E-mail: zoumin76@hotmail.com

便作文本对照,本文引用的《淮南子》相关原文段落,均以圆括号加数字予以标记,文字、标点以中华书局1998年版何宁《淮南子集释》为准,只将繁体字改作规范的简体字。

一、对于战争起源的几种认识

今本《淮南子·兵略训》开篇有两句话:

(1)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广而贪金玉之略,将以存亡继绝,平天下之乱,而除万民之害也。

(2)贪昧饕餮之人,残贼天下,万人搔动,莫宁其所。有圣人勃然而起,乃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除秽,以浊为清,以危为宁,故不得不中绝。

这里涉及战争起源的问题。接下来相隔约60字,又有两句类似的表述:

(3)夫兵者,所以禁暴讨乱也。

(4)教之以道,导之以德而不听,则临之以威武。临之威武而不从,则制之以兵革。

这两部分的文字都把战争起源总结为“平天下之乱”或“禁暴讨乱”。谢国良也注意到这一点,他指出,《淮南子·兵略》“从军事思想的角度来说,主要讲到了战争要存亡继绝、平天下之乱、除万民之害”^{[1]95}。但是,就在这两部分文字中间,又夹杂了一些其他的观点:

(5)凡有血气之虫,含牙带角,前爪后距,有角者触,有齿者噬,有毒者螫,有蹄者跌,喜而相戏,怒而相害,天之性也。

(6)人无筋骨之强,爪牙之利,故割革而为甲,铄铁而为刃。

这一部分文字把人类战争视为“天之性”,与“有血气之虫”等同。很明显,“天之性”和“禁暴讨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战争起源理论。

此外还有:

(7)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群居杂处,分不均,求不澹,则争。争则强胁弱而勇侵怯。

这句话把战争的原因归结为“分不均,求不澹”,这与“禁暴讨乱”或“天之性”的理论又有不同。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中国历代军事思想》把“分不均,求不澹”理解为《淮南子》所认为的“战争的起源”^{[4]187},把“禁暴讨乱”理解为《淮

南子》所认为的“战争的目的”^{[4]188},混淆了这两种区别很大的理论。《淮南子·兵略训》(7)句说“争则强胁弱而勇侵怯”,(2)句说“讨强暴,平乱世”,“强胁弱”、“勇侵怯”与“讨强暴”显然是矛盾的,它们之间完全不是“起源”与“目的”的关系。

不仅如此,在今本《淮南子·兵略训》原文中,这几部分文字是交杂在一起的,其中(5)(6)两句夹在(1)(2)两句之间,(7)句夹在(5)(6)两句之间,(3)(4)两句之间又夹有“炎帝为火灾,故黄帝擒之;共工为水害,故颛顼诛之”一句。学者常常忽略今本《淮南子》文本的杂乱现象,试图把这些互不关联的理论拼凑在一起,将其理解为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的整体。许匡一在《〈淮南子〉的军事思想》一文中说,《淮南子》的“作者认为:人要生存,财物不足,分配不均,引起纷争。强凌弱,勇欺怯,贪婪凶暴者残害天下,造成社会动乱。于是‘圣人’挺身而出,用武力除暴安良,这样便产生了战争”^[5]。这种表述,是把(5)句中的“天之性”理解为“人要生存”,然后再将“财物不足,分配不均,引起纷争”与“天之性”联系在一起,又把“财物不足,分配不均,引起纷争”与“贪婪凶暴者残害天下”理解为因果关系,最后得出战争是“用武力除暴安良”的结论。抛开《淮南子》原文,只看从“人要生存”到“用武力除暴安良”的逻辑,当然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仔细对照《淮南子》文本,就会发现,这样的理解是完全不符合《淮南子》原文实际情况的。(5)句中只说“喜而相戏,怒而相害”,并不涉及“生存”的问题,也不涉及(7)句所说的“物弗能足”、“分不均,求不澹”的问题;而(1)句只说“非利土壤之广而贪金玉之略”,(2)句只说“贪昧饕餮之人,残贼天下”,强调的是“贪”,与“物弗能足”、“分不均,求不澹”没有必然的联系。况且按照许匡一的表述,这几句话的顺序应该是(5)(6)(7)(1)(2),而《淮南子》原文的顺序却是(1)(5)(7)(6)(2),二者之间无法对应。事实上,《淮南子》原文如此杂乱,只能解释为存在大量注文篡入正文的情况。对于其中提到的多种观点,只能严格按照现有文本的文字和顺序,理解为出自多个注者的手笔,而不是随意根据想象去补充额外的内容。

从理论源头来看,今本《淮南子·兵略训》中“禁暴讨乱”、“天之性”、“分不均,求不澹”等三种

战争起源理论,也各有各的学术源流。

按照冯友兰、谢国良等学者的观点,“禁暴讨乱”的理论早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出现,最初源自奴隶主对于奴隶的镇压行为。“商、周帝王……注重以‘仁义’为本,‘吊民伐罪’,实现奴隶主为主的‘民’的利益”^{[1]83},“一方面要‘敬天’……另一方面还要‘保民’”^{[6]79}。到了春秋末期的管仲那里,就有了“诛无道,以定周室”的说法^{[7]413},这可能是“禁暴讨乱”理论的雏形。(4)句说“教之以道,导之以德而不听,则临之以威武”,这里所说的“德”,也就是《诗经·大雅·文王》“无念尔祖,聿修厥德”的“德”^{[8]826}。“周初的统治者,又告诫周朝的贵族们,使他们认识到,要保持他们的地位,必须‘有德’,专靠天命是不行的”^{[6]78},所以,《左传·僖公五年》引《周书》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9]338}。“临之以威武”作为最终的惩罚措施,是与“教之以道,导之以德”紧密联系的。所以“禁暴讨乱”的理论,其核心的概念是“道”、“德”,这也正与(1)句所说的“非利土壤之广而贪金玉之略,将以存亡继绝,平天下之乱,而除万民之害”相对应。类似的表述还可以在一些先秦著述里找到。例如,《老子》第46章说:“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10]185}《尉缭子·武议》说:“故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11]231}《吴子兵法·图国》也说:“明主鉴兹,必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是以圣人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则兴,废之则衰”^{[11]86-89}。在这种理论的基础上,今本《吴子兵法》又提出“义兵”说:“凡兵者……其名又有五:一曰义兵……禁暴救乱曰义”^{[11]91}。应该说,“禁暴讨乱”的战争起源理论发端早、传承久、流传广,是比较主流的一种理论。

“天之性”的战争起源理论可能与孙武有关。《孙臆兵法·势备》引孙武语“夫陷齿戴角,前蚤后锯,喜而合,怒而斗,天之道也,不可止也”^{[12]79},《淮南子》(5)句显然和这句话有着直接的关系。其后,《吕氏春秋》也有类似的论述,其《荡兵篇》说:“兵之所自来者上矣,与始有民俱。凡兵也者威也,威也者力也。民之有威力,性也。性者所受于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武者不能革,而工者不能移。”^{[13]157-158}所谓“性者所受于天也”,也就是(5)所说的“天之性也”。

“分不均,求不澹”的战争起源理论出现较晚,从现有材料来看,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末期的《韩非子》。陈远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述略》一文中指出:“韩非用社会进化论观点分析战争起因,认为随着社会人口增加,社会财富相对减少,人类必然发生战争。”^[14]《韩非子·五蠹》篇说:“古者……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今人……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15]443}所谓“人民众而货财寡”,也就是(7)所说的“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当代学者朱新林说“《淮南子·兵略》……认为人类的战争起源于‘分不均,求不澹’,而这种观点肇自《孙臆兵法》。《孙臆兵法·势备》引孙子云:‘夫陷齿戴角……’”^{[16]64},这是混淆了“天之性”与“分不均,求不澹”两种不同的理论。

除《兵略训》外,今本《淮南子·本经训》中还阐述了另一种战争起源理论:

及至分山川溪谷,使有壤界,计人多少众寡,使有分数,筑城掘池,设机械险阻以为备,饰职事,制服等,异贵贱,差贤不肖,经排誉,行赏罚,则兵革兴而分争生,民之灭抑夭隐,虐杀不辜而刑诛无罪,于是生矣。

这一段文字把战争的起源归因为人类“分山川溪谷”、“计人多少众寡”、“异贵贱”、“行赏罚”等后天人为的结果。这一战争起源理论与先秦道家思想更为接近。例如,《老子》认为,“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10]292},“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物滋彰,盗贼多有”^{[10]231-232},所以要“不上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盗;不见可欲,使心不乱”^{[10]14}。《老子》“无为”的学说正是建立在将自然之道与人为规则加以对立的基础上,《本经训》中的战争起源理论与之一脉相承。《兵略训》中“天之性”的战争起源理论也与道家思想较为契合,而“禁暴讨乱”和“分不均,求不澹”的战争起源理论,不但具体内容上相互之间存在冲突,其学术源流也有着显著的区别,同时也与道家思想相去甚远,应该视为《淮南子》中的注文。

二、对于战争基础的几种理解

今本《淮南子·兵略训》有一些内容涉及对

于战争基础的理解:

(8)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强。……所谓道者,体圆而法方,背阴而抱阳,左柔而右刚,履幽而戴明,变化无常。

这段话把战争基础理解为“道”。这里的“道”表现出“变化无常”的特性,显然属于道家学术框架下的“道”,而不是“教之以道,导之以德”的“道”。那么,这个“道”是怎样决定战争胜负的呢?今本《淮南子·兵略训》也做了一些说明:

(9)所贵道者,贵其无形也。无形则不可制迫也,不可度量也,不可巧诈也,不可规虑也。

(10)无形而制有形,无为而应变,虽未能得胜于敌,敌不可得胜之道也。

所谓“无形则不可制迫也,不可度量也,不可巧诈也,不可规虑也”、“无形而制有形,无为而应变”,都是“道”、“变化无常”特性的具体运用。《淮南子·原道训》讲:“夫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栝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授无形。”^{[17]2}“夫无形者物之大祖也,无音者声之大宗也。其子为光,其孙为水,皆生于无形乎!”^{[17]57}“道”是“禀授无形”的,而“无形”则是万物之祖。《史记·太史公自序》讲:“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无成执,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18]3289-3292}这也指出道家思想“动合无形”、“无常形”的特点。(8)句将战争基础归结为“变化无常”的“道”,其背后的理论支撑显然是来自道家思想。

现存兵家著作中也有“无形”的概念,例如今本《孙子兵法·虚实篇》讲:“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19]112-122}乍一看,似乎兵家也说“无形”。但紧接“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一句,又说“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夫兵形象水……兵之形,避实而击虚”^{[19]123-124}。既然“形兵之极,至于无形”,又哪来的“我所以胜之形”、“吾所以制胜之形”、“兵之形”呢?即便把这里的“无形”理解为“无常形”,来勉强解释“形兵之极,至于无形”与“兵之形”的矛盾,但“无常形”的理解又与“微乎微乎,至于无形”中的“无形”相矛盾。这样的矛盾也同样出现

在《史记·太史公自序》关于“无形”和“无常形”的论述之中。综合判断,现存兵家著作中关于“无形”的论述,究竟是否出自兵家,抑或是后世注家的注释,恐怕还是一个疑问。

除了“变化无常”的“道”,今本《淮南子·兵略训》对于战争基础还有其他的论述:

(11)兵之胜败,本在于政。

(12)凡用兵者,必先自庙战:主孰贤?将孰能?民孰附?国孰治?蓄积孰多?士卒孰精?甲兵孰利?器备孰便?故运筹于庙堂之上,而决胜乎千里之外矣。

(13)兵有三诋:治国家,理境内,行仁义,布德惠,立正法,塞邪隧,群臣亲附,百姓和辑,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诸侯服其威,而四方怀其德,修政庙堂之上,而折冲千里之外,拱揖指撝而天下响应,此用兵之上也。地广民众,主贤将忠,国富兵强,约束信,号令明,两军相当,鼓鐃相望,未至兵交接刃而敌人奔亡,此用兵之次也。知土地之宜,习险隘之利,明奇正之变,察行陈解赎之数,维袍缩而鼓之,白刃合,流矢接,涉血属肠,舆死扶伤,流血千里,暴骸盈场,乃以决胜,此用兵之下也。

(11)句“本在于政”、(12)句“必先自庙战”、(13)句“兵有三诋”,都与道家思想相去甚远。今本《孙子兵法·计篇》讲:“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19]20}《淮南子》中的“庙战”一词与《孙子兵法》中的“庙算”一词同出一源。今本《孙子兵法·计篇》“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19]9-11}这一句与(12)句如出一辙,其理论来源也应相同。(11)句“本在于政”、(12)句“运筹于庙堂之上”与(13)句“兵有三诋”中的“修政庙堂之上……此用兵之上也”,其实是一个意思,都是在强调战争的基础在于国家的治理,与今本《孙子兵法》“兵者,国之大事”^{[19]1}的认识有着关联。(13)句“兵有三诋”中的“未至兵交接刃而敌人奔亡,此用兵之次也”和“暴骸盈场,乃以决胜,此用兵之下也”,也都与今本《孙子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19]45-48}的说法相关。

从现存文献来看,似乎《淮南子》(11)句“本在于政”的战争基础理论,与以孙子为代表的兵家有着密切关系。冯友兰认为,孙武指出“战争取得胜利需要五个先决的条件(‘五事’)……首先是统治者必须使老百姓与他的意志一致”^{[6]211}。《中国历代军事思想》也说:“孙子在《计篇》第一中,首先指出……战争的胜利,首先是要取得人民的拥护。”^{[4]54-55} 他们的判断,显然都是依据现存的《孙子兵法》一书。但《荀子·议兵》记载临武君谈论战争基础讲:“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敌之变动,后之发,先之至,此用兵之要术也……兵之所贵者执利也,所行者变诈也。善用兵者,感忽悠暗,莫知其所从出,孙、吴用之,无敌于天下,岂必待附民哉!”^{[20]265-266} 临武君的话是与荀子针锋相对的。在《荀子·议兵》中,荀子也对战争基础有一番议论:“臣所闻古之道,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贵,权谋执利也;所行,攻夺变诈也;诸侯之事也。”^{[20]266} 在荀子看来,战争基础在于“附民”,与《淮南子》(13)句“此用兵之上也”中“群臣亲附,百姓和辑,上下一心,君臣同力”的观点相同。而临武君的战争基础理论是不包括“附民”的,所谓“孙、吴用之,无敌于天下,岂必待附民哉”。按照临武君的说法,以孙武、吴起为代表的兵家,其战争基础理论不应有“附民”。今本《孙子兵法·计篇》中“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19]3}的论述存在后人补改的可能。从理论源流来看,“附民”的观点可以上溯到孟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21]241}与“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21]367}的思想,进而追溯到孔子“修己以安人”与“修己以安百姓”^{[22]1041}的观念,以及周公时期“敬天”、“保民”^{[6]79}的理论。(11)句所说的“本在于政”,其学术源头似乎还应早于《孙子兵法》。总之,《淮南子·兵略训》(11)(12)(13)句所表达的“本在于政”的战争基础理论,与(8)(9)(10)句所表达的以“无形”之“道”为战争基础的理论,有着显著的差别。后者思想与道家一致,应为《淮南子》原文;而前者更接近儒家思想,应为《淮南子》中的注文。

三、对于临敌制胜条件的几种判断

今本《淮南子·兵略训》又有一些内容涉及

到对于临敌制胜条件的判断:

(14)神莫贵于天,势莫便于地,动莫急于时,用莫利于人。凡此四者,兵之干植也,然必待道而后行可一用也。

本句把临敌作战条件归结为“天”、“地”、“时”、“人”四个方面,又说“必待道而后行”,最终仍旧归结为“道”。“天”、“地”、“时”、“人”四个方面的总结,与《荀子·议兵》中临武君“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敌之变动,后之发,先之至,此用兵之要术也”的总结有相似之处,可能出自兵家的理论,但又与今本《孙子兵法》“五事”有所不同。《孙子兵法·计篇》讲:“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19]2-7}其中提及“天”、“地”、“将”,可与(14)句“天”、“地”、“人”相对应,但缺少可以与(14)句“时”相对应的内容。

(14)句将“时”与“动”相联系,这里的“时”应该是“时机”的意思,与《孙子兵法·计篇》中的“时制”不同。现存兵家文献中,用“时”这个词来指代“时机”比较少见,《吴子兵法》中有载“武侯问敌必可击之道。起对曰:‘用兵必须审敌虚实而趋其危……失时不从,可击……’”^{[11]103},这是现存兵家文献中不多的用“时”来表示“时机”的例子。在论述“时机”这一概念的时候,现存兵家文献更多的是用“势”这个词来表达。《孙子兵法·计篇》讲:“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王皙注:“势者,乘其变者也。”^{[19]11-12}这里的“势”与“计”、“因”、“乘”联系在一起,强调的是对“变”的把控。而(14)句将“势”与“地”联系在一起,强调的是“便”,与《孙子兵法》“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有相通之处。此外,(14)句“必待道而后行”,与(8)句“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强”的“道”,是否同属道家的“道”,也是一个疑问。今本《淮南子·兵略》“必待道而后行”一句,上下文都没有明确的线索可供判断“道”的具体含义,而《孙子兵法·计篇》又有“一曰道……道者,令民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19]2-3}的文字,所以(14)句“必待道而后行”的“道”,也有可能是兵家的“道”。

今本《淮南子·兵略训》又说：

(15)兵之所隐议者天道也，所图画者地形也，所明言者人事也，所以决胜者钤势也。

这句话也提到“天”、“地”、“人”，而且把“天”与“道”联系在一起。相比之下，在(14)句“神莫贵于天……必待道而后行”的表述中，“天”和“道”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概念，且“道”的重要性要高于“天”，这与(15)句“天道”的说法明显有着矛盾。(15)句又说“决胜者钤势也”，把“势”作为制胜的首要条件，这与(14)句“必待道而后行”的表述也有着矛盾。

今本《淮南子·兵略训》还说：

(16)兵有三势，有二权。有气势，有地势，有因势。将充勇而轻敌，卒果敢而乐战，三军之众，百万之师，志厉青云，气如飘风，声如雷霆，诚积踰而威加敌人，此谓气势。硖路津关，大山名塞，龙蛇蟠，却笠居，羊肠道，发笥门，一人守隘而千人弗敢过也，此谓地势。因其劳倦怠乱，饥渴冻暵，推其褻褻，挤其揭揭，此谓因势。善用间谍，审错规虑，设蔚施伏，隐匿其形，出于不意，敌人之兵，无所适备，此谓知权。陈卒正，前行选，进退俱，什伍搏，前后不相撿，左右不相干，受刃者少，伤敌者众，此谓事权。

这段话把“势”分为“气势”、“地势”、“因势”，与(14)(15)句都不相同；又提出“知权”、“事权”的概念。现存兵家著作中，“权”常常是与“势”、“因”联系在一起，例如前引《孙子兵法·计篇》说“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吴子兵法·用将》也说“凡战之要，必先战其将而察其才，因形用权，则不劳而功举”^{[11][17]}。把“权”与“知”、“事”联系在一起，似乎没有明确的理论根据。今本《吴子兵法·论将》有一段话：

凡兵有四机：一曰气机，二曰地机，三曰事机，四曰力机。三军之众，百万之师，张设轻众，在于一人，是谓气机；路狭道险，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过，是谓地机；善行间谍，轻兵往来，分散其众，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谓事机；车坚管辖，舟利橹辑，士习战陈，马闲驰逐，是谓力机。知此四者，乃可为将。^{[11][15]}

把这段话与(16)句相对照，可以发现，(16)

句“气势”与“地势”，就是《吴子兵法·论将》中的“气机”与“地机”；(16)句“知权”与“事权”，就是《吴子兵法·论将》中的“事机”与“力机”。而(16)句中的“因势”，《吴子兵法·论将》中则没有可以对应的内容。据此判断，《淮南子·兵略训》(16)句很有可能就是源自《吴子兵法·论将》，只是细节上又有所改动。日本学者谷中信一认为“《吴子》一书……然而事实上几乎很难找到《兵略训》与它的关联之处”^[23]，应该是不准确的。

综上所述，今本《淮南子·兵略训》对临敌作战条件的总结，既与兵家思想相通，又与兵家论述不同，不但存在多个理论来源，而且毫无条理层次可言，前后文又经常自相矛盾，极有可能是后世注家注解《淮南子》，在援引兵家思想的同时又有自己的发挥，从而导致这种混乱的情况。

四、关于将领指挥原则的几种总结

与论述临敌制胜条件的文字相似，今本《淮南子·兵略训》对于将领指挥的论述，也表现出既与兵家思想相通，又与兵家论述不同的特点，且存在多种互相有所区别的表述。例如：

(17)故上将之用兵也，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乃行之以机，发之以势，是以无破军败兵。及至中将，上不知天道，下不知地利，专用人与势，虽未必能万全，胜钤必多矣。下将之用兵也，博闻而自乱，多知而自疑，居则恐惧，发则犹豫，是以动为人禽矣。

这段文本自身就充满疑问。“上将”一句涉及“天道”、“地利”、“人心”、“机”、“势”等概念；而“中将”一句中，“人心”变成了“人”，“机”的部分则完全消失。“上将”一句说“上得”、“下得”，而“中将”一句说“上不知”、“下不知”，应该说“得”与“知”还是有所区别的，这就提示这段话中，“上将”一句和“中将”一句，可能也是出自不同注者的手笔，原本注家只是论述“上将之用兵”，其后又有注家补充了“及至中将”一句。“下将”一句更是可疑，“中将”已经是“上不知”、“下不知”了，可“下将”却是“博闻”、“多知”，又全然没有“天道”等概念的影子，很可能又是一家注者的手笔。从文例的角度分析，“上将”、“下将”两句同样用“之用兵也”开头，用“是以”结尾，“博闻而自乱，

多知而自疑”可以视为“不得”，又“行”、“居”对举，所以也很有可能“上将”、“下将”两句出自同一注者，而“中将”一句则出自另一注者。再与同样提到“天”、“地”、“人”、“势”等概念的(14)(15)句对照，可以发现(14)(15)句完全没有提到“机”这个的概念，在这个概念上(17)句与(14)(15)句无法呼应。仅从这些对照就可以看出，今本《淮南子·兵略训》中的这些文字是相当混乱的，只能理解为后世注家的注文。

从理论源头来看，“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的提法，最早似乎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的兵书《军志》。现存《军志》佚文有“失地之利，士卒迷惑，三军困败。饥饱劳逸，地利为宝，不其然矣”^{[24]4088}、“先人有夺人之心”^{[9]807}等句，“失地之利”讨论的是“地利”，“夺人之心”讨论的是“人心”。“机”的概念出现得相对较晚，现存兵家文献中，除了《吴子兵法》，还有《六韬》也经常谈论“机”，例如《守国》说“仁圣之道，民机之情”、“夫民动而为机，机动而得失争矣”^{[11]376-377}。一般认为，《吴子兵法》和《六韬》均成书于战国晚期，相较于《军志》而言，时代上要晚了很多。(17)句把这些不同来源的概念混杂在了一起，与注家的注释手法更为接近。

再例如下面这一段话：

(18)将者必有三隧、四义、五行、十守。所谓三隧者，上知天道，下习地形，中察人情。所谓四义者，使国不负兵，为主不顾身，见难不畏死，决疑不辟罪。所谓五行者，柔而不可卷也，刚而不可折也，仁而不可犯也，信而不可欺也，勇而不可陵也。所谓十守者，神清而不可浊也，谋远而不可慕也，操固而不可迁也，知明而不可蔽也，不贪于货，不淫于物，不嗑于辩，不推于方，不可喜也，不可怒也。

这一段的表述，除“三隧”与(17)句相近外，其他部分都有着差别。仔细分析起来，“五行”中的“仁”、“信”、“勇”，与《孙子兵法·计篇》“将者，智、信、仁、勇、严也”的论述相近。

“四义”、“十守”的表述，与《吴子兵法·论将》“故将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理者，治众如治寡；备者，出门如见敌；果者，临敌不怀生；戒者，虽克如始战；约

者，法令省而不烦”^{[11]114}的论述相近。《六韬》中有“六守”的论述：“文王曰：‘六守何也？’太公曰：‘一曰仁，二曰义，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谋；是谓六守。’”^{[11]371,372}对照起来，(18)句“十守”中的“神清而不可浊”、“操固而不可迁”，与“六守”中的“仁”、“义”、“忠”、“信”大致相同；“十守”中的“谋远而不可慕”，与“六守”中的“谋”可以对应。“十守”的概念与“六守”的概念也有着一定的关系。这样前后段落不能呼应，且理论来源混淆杂乱的文字，也极有可能原本是注家的注文。

此外，今本《淮南子·兵略训》最后有一段关于将领受命出征的描述：

(19)凡国有难，君自宫召将，诏之曰：“社稷之命，在将军即今国有难，愿请子将而应之。”将军受命，乃令祝史太卜斋宿三日，之太庙，钻灵龟，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庙门，西面而立；将入庙门，趋至堂下，北面而立。主亲操钺，持头，授将军其柄，曰……

《淮南子·兵略训》全篇都在说理，只有本段记事，显得十分突兀。今本《尉缭子·将令》讲：

将军受命，君必先谋于庙，行令于廷。君身以斧钺授将，曰……^{[11]275}

(19)句显然与《尉缭子·将令》有着密切关系。今本《淮南子·要略》讲：

《兵略》者，所以明战胜攻取之数，形机之势，诈谲之变，体因循之道，操持后之论也，所以知战阵分争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坚守之非德不强也。诚明其意，进退左右，无所失击危，乘势以为资，清静以为常，避实就虚，若驱群羊，此所以言兵者也。

按照《要略》的说法，《兵略训》的内容应以“数”、“形机之势”、“变”、“因循之道”、“持后”、“清静”等概念为核心内容，这也与学术界一般所理解的《淮南子》道家思想背景相一致。以《淮南子》道家文献的背景，杂入(19)句这样明显出自兵家的文献，除了理解为注家注文羸入之外，也难以有更为合理的解释。

五、余论

由于《淮南子》很多篇幅都在讨论抽象的道家理论，即使有语句不能连贯、逻辑出现偏差的情况，往往也表现得非常细微，分辨起来很困难。

即便如此,通过上文的分析,也还是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今本《淮南子·兵略训》中的多种军事思想之间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冲突。其中,很多军事思想的理论源头与先秦道家思想也没有明显联系。除了上文所举的例子之外,今本《淮南子·兵略训》还有许多明显互相矛盾的句子。例如,其中既有“用莫利于人”的表述,又有“兵以道理制胜,而不以人才之贤”的说法,“莫利于人”与“不以人才之贤”显然是矛盾的;“兵……动则凌天振地,抗泰山,荡四海,鬼神移徙,鸟兽惊骇”的表述,明显与“虎豹不动,不入陷阱;麋鹿不动,不离罟罟;飞鸟不动,不挂网罗;鱼鳖不动,不撮蜃喙;物未有不以动而制者也”的表述矛盾。这些相互冲突的段落,是无论如何不能以正常的写作逻辑来理解的。同时,这些文字在今本《淮南子》中完全没有文献汇编所应有的条理性,呈现出杂乱无序的状况,也难以用“淮安王刘安以文辩致

天下方术之士,会萃诸子,旁搜异闻以成之”^{[17]1501}来解释。朱新林认为:“在西汉时代,融汇先秦兵家思想的文献则集中体现在《淮南子·兵略》篇中。刘安以西汉诸侯王的身份在《兵略》中集中阐述了他的兵家思想,这种带有再创造形式的对先秦兵家思想的总结已经不同于西汉官方对兵书的整理,更多地带有学术讨论的色彩。……此篇撷取战国兵家之长,成一家之言。”^{[16]63}应该说,以今本《淮南子·兵略训》的实际情况来看,完全谈不上是“带有再创造形式的对先秦兵家思想的总结”,也很难看出“学术讨论的色彩”,更称不上“成一家之言”。最合理的解释还是,这些杂乱文字属于后世注家的注文。注家援引前代各种军事理论对《淮南子·兵略训》作阐释,又加上各自的理解发挥,从而导致今本《淮南子·兵略训》存在多种相互冲突的军事思想,同时在文字上也表现的凌乱无章、难以卒读。

参考文献:

- [1]谢国良.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概论[J]. 军事历史研究, 1995(1): 80-108.
- [2]邹旻. 今本《淮南子》中“属书”和“书论”两种文本论析:兼论《鸿烈》为《淮南内》“书论”之名[J]. 滁州学院学报, 2022(3): 51-56.
- [3]邹旻. 试论今本《淮南子》中几种类型的文本错乱现象及其成因[J]. 安徽理工大学学报, 2023(6): 56-63.
- [4]《中国军事史》编写组. 中国历代军事思想[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07.
- [5]许匡一. 《淮南子》的军事思想[J]. 武汉教育学院学报, 1995(1): 95-102.
- [6]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新编: 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8.
- [7]黎翔凤. 管子校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 [8]王先谦. 诗三家义集疏[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9]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修订本)[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 [10]朱谦之. 老子校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 [11]骈宇騫, 李解民, 盛冬铃, 等. 武经七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 [12]张震泽. 孙臆兵法校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13]许维遹. 吕氏春秋集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 [14]陈远.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述略[J].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5(1): 33-37.
- [15]王先慎. 韩非子集解[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 [16]朱新林. 《淮南子》与先秦诸子承传考论[D]. 杭州: 浙江大学, 2010.
- [17]何宁. 淮南子集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 [18]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19]杨丙安. 十一家注孙子校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 [20]王先谦. 荀子集解[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 [21]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22]程树德. 论语集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 [23]谷中信一. 从《兵略训》看齐文化对《淮南子》成书的影响[J]. 王海清, 译. 管子学刊, 1993(3): 41-49.
- [24]杜佑. 通典[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Analysis of Various Conflicting Military Thoughts in the Current Version of *Military Strategy and Training of Huainanzi*

—Simultaneously Proving the Widespread Phenomenon of Annotations Being Inserted into the Main Text in the Current Version of *Huainanzi*

ZOU Mi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ainan 232001,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various clear conflicting military thoughts in the current version of *Military Strategy and Training of Huainanzi*, involv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origin of war,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s of war, the judgment of the conditions for winning against the enemy and the summary of the principles of commanding generals. The reason for this phenomenon is that the current version of *Huainanzi* contains a large number of annotations that may have originated from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he commentators have cited various military theories from previous generations to interpret *Military Strategy and Training of Huainanzi* besides their own interpretations, resulting in the existence of multiple conflicting military thoughts in the current version of *Military Strategy and Training of Huainanzi*. At the same time, the text is also disorganized and difficult to read. Clarifying these intertwined and conflicting military thoughts and identifying their theoretical origins and era of emergence can help enrich the details of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hinese military theory and provide some evidences for the widespread phenomenon of annotations being inserted into the main text of the current version of *Huainanzi*.

Keywords: *Military Strategy and Training of Huainanzi*; current version; commentator; military thoughts; insert annotations

(责任编辑:许 金)

引用格式 邹旻. 今本《淮南子·兵略训》中多种互相冲突的军事思想辨析:兼证今本《淮南子》中普遍存在注文属入正文现象[J]. 山东航空学院学报, 2024, 41(2): 25-33. ZOU Min, Analysis of Various Conflicting Military Thoughts in the Current Version of *Military Strategy and Training of Huainanzi*: Simultaneously Proving the Widespread Phenomenon of Annotations Being Inserted into the Main Text in the Current Version of *Huainanzi*[J]. Journ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2024, 41(2): 25-33.